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主编 / 张志扬 余虹

耿占春

改变世界与 改变语言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主编 / 张志扬 余虹

耿占春

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 / 耿占春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12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ISBN 7-80149-448-2

I . 改… II . 耿… III . 诗歌 - 文学理论 - 研究 - 文集
IV . I05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468 号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



丛书主编：张志扬 余 虹

著 者：耿占春

丛书策划：吴伯凡

责任编辑：江 河 张 敏

版式设计：辛 诉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13.25

字 数：292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48-2/B·071 定价：25.00 元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总 序

南冥有木，彷徨 乎无为其侧

我们经历的变化，恐怕算得上 3000 年之衰变：从有“辉煌”历史的封建社会向没有“辉煌”历史的现代社会转变。有人言，一个人的成长期要缩影般地重现他的史前史。又有人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两句话似乎特别适合 20 世纪 100 年。也就是说，只要活在这个世纪，漫长的中国历史也就在将来机缘的吸取中都活过来了，可以成人。我们是有幸的。

然而，那么多仁人志士，在文化史上所留给我们的记录，问题轻重结论，责任消长磨难，如此周期失衡以至我们不敢做传火之薪窃仁人之名，只有退避天涯以求偏隅之安，把“学问”二字做成“贴己”而已。

所谓“贴己”，不是“私房话”，说得雅一点，叫“私人语言”，不是；也不是“贴身”的“绝活”，像武林秘笈；而是“由着性子做”。

 ······ 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

海南地处边缘，有意外的人文性质，重力不重，气压不压，阳光、沙滩、海浪，净化着文明的烟尘，少许些技术僭越的骄狂，也少许些历史怀古的忧伤，没有亡灵的召唤，没有寒热的激情，没有牡丹芍药国色天香，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没有泰山极顶东临碣石，没有暗香浮动疏影横斜，没有萧墙刀光古刹钟声，没有小桥残阳流水人家……命脉浮浅，国粹稀薄，伤春悲秋，都不是时候，省了许多牵挂。虽然我们不是图这而来，自然的清新空气，或许淡漠了盘根错节的历史底蕴，倒也疏朗了一点思想的骨架。

“地缘学”是近千年兴起的。西方有海洋文明与土地文化的分别，直到今天，“海洋”仍然是冲淡“土地与血”的潜在抗体。

中国则早有它的属性意识：“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儒家是仁者，志在庙堂之高；庄周恐怕要算智者了，常在南冥秋水之间。

这些我们都无法说不上。此次海南大学决定人文学科集结首批“丛书”，虽有地缘的形式，却很难说有地缘的特征。如果硬要说点什么，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贴己”。学问有多种做法，怎么做，全然是各人自己的事；没有受命没有传承没有挂碍的自主姿态倒是共同的。

例如，在文艺学领域，从古典文献到现代文论，从文字触觉到精神生态，各自的伸展，都有别人不到之处。

张三夕的《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按作者的说法，主要点不在于“铺摊子”——校雠学、文学史、史学史、思想史，都有案头功力的磨砺与学理的铺陈；而在于“收摊子”，即借鉴西方学术思想的方法，激发对永恒的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国学的根底上，写一部由问题意识引导的有“个人视角”、有“思想”的思想史。

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 · · · ·

余虹的《艺术与精神》，提出文学艺术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精神品质几乎丧失殆尽，这究竟是现代引以为荣的标志，还是需要警惕的病症？为了探寻当代文艺的精神性失重的根源，作者清理了三条道路：①西方现代艺术之思的道路；②中国20世纪文艺革命的道路；③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道路。谨作为未来文艺之思的“路标”。

鲁枢元的《猞猁言说》，集中呈现了作者一贯锐意探索开拓的足迹：从80年代中期的“创作心理”、后期的“文学言语”到90年代的“精神生态”，或者说，从“向内转”到“超越语言”到将“精神因素”引入地球生态系统以期为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寻求新的拯救之途。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对当时社会惯性的偏斜，像伊壁鸠鲁的“自由原子”。

耿占春的《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是“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吵”的集语。作者暗中渴慕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然而又只是一种有限个人的话语的写作，因此也是与“一个”、“日期”、“一种语言”、“一个自传式的署名”分不开的，在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收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潜能。这未必只是使作者发生兴趣的梦想地。

又如，在哲学领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关切与开拓，到西方现代哲学的汉语解殖与言说，各自的探寻，也有别人不到之处。

曹锡仁的《中国问题散论》，从80年开始，最初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此追寻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而把中国文化的选和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作为新的研究起点，正好表达出关切中国现代命运的人文学者治学的价值取向。



.....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

“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提问方式，也不单纯是政府高层的决策专利，它必须融入专业学者的独特视野，才能合理提供坚实的社会体察与学理根据的保证。

萌萌的《情绪与语式》，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悲剧、易卜生悲剧、贝克特以及现代日常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如何在不断地挣脱历史理性的定式寻求自己生成着的表达。这种“断裂的声音”之捕捉早在80年代中期就迫使作者转向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而且还要反省作为“身体”物性的“二重情绪”同“三类语式”的交互共生性，以通往公共语言何以作个人表达的可能之途。

陈家琪的《经验之为经验》，是对我们最“上手”几乎构成我们生活的“经验”不断流失以至于变成苍白这一事实“震惊”后的思索。于是重提康德式的问题“经验何以成其为经验”与海德格式的问题“作为经验的经验是什么”。作者要像胡塞尔“面对事物本身”样的“面对经验本身”。“经验”不能按已成知识的“经”（在先）与“验”（上手）的相互匡合来理解，经验的普遍性只能在经验自身的构成（生成）中获得描述。

张志扬的《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呈现了“1989～1999”十年的主要问题与思路，其实说起来只一句话：“如何走出‘只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本质主义与‘怎样都行，怎样都不行’的虚无主义的循环”。提出被还原了的“偶在论”，不过是一种尝试，也还只是消极的检测与防御，对包括哲学在内的现代性理论思考，只能算作前提性的准备。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技术的图象，以至我们的思维也开始在数码与图象之间训练有“数”。或许工于计算的人有福了。幸好人是隐含否定于自身的偶在者，他一方面要接受数

码与图象的度量而不得不规范化，另一方面，他又难免例外地要承受大地与苍穹的跨度，使那想象的空间连人不可兼并不可让度的隐私，终究守护着人可偏离的自由。或许善于例外的人有福了。

生长并传播教育的教育之地，现在有最功利的企图，没有比这更跛足短视的不幸。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以为它能靠自身的自然增长而脱去科技神话的巫魅。可是它们忘了，它们的“不完全定律”是不可能为自己寻找到“第一推动力”的，无论是宇宙的内和外。

海南的信使，但愿他有幸从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走来，只需带着清新的空气。我们感谢这一片土地。当然也感谢海南大学注视文科的精神——“山不在高，有神则灵；海不在深，有珠则润”。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一个人的情形和另一个人的情形一样。然而只不过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误入歧途。”

相对那些自明的“高速公路”，“林中路”常常是“误入歧途”的，所以“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

或许，这正是我们向往的吧。

“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



序

耿占春

在检索自己以往的文字的时候，我发现它们越往后越随笔化。这也许是一些年来“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吵”的结果。也许是文学的诱惑（它发生在童年时代），即使在更理论形态的写作中，我也无法抵抗“我”的在场的诱惑：使用个人经验的诱惑，使用个人感受、印象与记忆的诱惑。尽管我知道：在越来越复杂的知识地图上，个人经验成为一种范式、一种知识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引用自我经验、生活场景与引用各类书籍对我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引文价值。这是一种既是“自传式”、又是“理论与批评式”写作的诱因。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一种自传式的理论写作。

这种写作既非文学的，或仅只是借助理论思考的文学写作，也非哲学的，借助一些个体经验或文学方式的哲学写作。它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企图：想用一切方法写下一切的愿望。当然这既是不可能又是无法终结的事情。

虽然我对这种写作既未想清楚，也未写得令人满意，可我也不可能装作这种写作方式或想法是首创的。德里达（在我看来不该是他）在对文学的建制的思考中已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梦想。

“直到今天，我心中依然有一种执着的欲望，用回忆的形式，不间断地记录下发生的事——或未能发生的事。我总

· 想斥之为诱惑的东西——即总记或总括——不正是维系我生命的动力吗?”

序 ······ 这种“内心集语”的想法，既是“镜象”式的，又是“思辩的”。它包含着历史的记述、文学的想象力与哲学反思。它渴望以一种独特的主旨往返于文学与哲学之间。这种写作既是对固有文体类型的一种分解，又是一种“极度总括的过分行为”。德里达谈到他所感兴趣的第一批文本，其中包括卢梭、纪德和尼采。他们既不单是文学，又不单是哲学，而是属于“内心集语”。这些“用第一人称讲话的哲学家”（还应加上《论语》、《庄子》等文本），一面又在增殖“专有名称，面具与署名”。它不肯放弃个人内心的声音，又不肯放弃“运载这些声音的‘文化’”。德里达说：“在这一点上，包含各学科的诱惑变得与自传体不可分割了。”

应该说“包含各学科”是一种勉强的说法。使用个人的声音，又不放弃个人的声音的文化背景，这种声音与别的声音的互文性，这种“总括”式的表述并非一种学科上的野心，而只是力图写出一切的欲望。

与我们一生中经验的、想象的、感受的与阅读的相比，话语的某一类型或某一单一的文体允许我们讲述的，显得十分狭隘。它使我暗中渴慕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然而又只是一种有限的个人的话语的写作。“然而这种历史的、语言的、百科全书的浓缩，仍然是与绝对单独的活动、绝对单独的署名分不开的，因此也是与一个日期、一种语言、一个自传式的署名分不开的，在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收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潜能——这的确是使我发生兴趣的地方。”

目 录

序 / 1

新诗的创造性想象 / 3

论想象的形式 / 38

独立的世界与开放的自我

——三种艺术个性素描 / 53

语言的欢乐 / 80

在语言返回根源的途中 / 96

最后一个祭司 / 110

隐喻与体验 / 118

隐喻的极限 / 131

创世神话与诗的本质 / 146

A

目 录

B

- 死是一种习俗 / 161
- 面对神秘 / 182
- 时间是你身上的病 / 202
- 生活世界的毁灭 / 224
- 我们活着 / 241

C

- 苦难的释义学 / 261
- 向初始时间的复归 / 293
- 末世学的革命 / 329
- 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 / 363
- 话语活动的想象物 / 380
- 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 / 390

校后记 / 404

--A--



人学会了思考，那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学会的。而且，没有人能够一劳永逸地代替我们思考。每一代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问题。不容简约的“我思”是个体存在的基础，但在日常的计算思考和推理思考中，我们日益失去思考的真正本质。这种思考不能让我们面对人生与世界的奥秘，而是把我们关闭在已知事物的圈子里。它给予我们一种假的安全感。随着“我思”越来越失去它的本质，“我在”也失去了意义。

必须有不属于计算思考与推理思考的另一种思考。

这是诗的想象力。它使人的精神超越现象事物的界限，超越概念上的思考方法的平庸水准，超越理知的虚假而短视的合理性。这是基于意象的思考，它把人的精神引向并还原于根据。

据说人的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而人类最伟大、最富有价值的思想来源于审美感受。艺术是最富于人性的感觉。诗就是对由语言—意象所支配着的整个感觉领域——“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和实践感觉”——的探索。诗瘫痪了我们的理性思考——即否定了僵死的概念与物化的理性——使我们的概念重新溶解于生命—意识之流和“潜感觉材料”之中。从我们沉浸于其中的这种生命海洋中，我们吸取从事创造和从

4. 4 ····· 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

· 事生活的那种力量，“而我们感到，我们的存在，或者至少是指导我们的那种理智，在这里是由一种局部的凝聚所形成的。”在诗的意象、意向和感觉的冲击中，我们的概念——理知再度溶解于“整体”和源流中，“这样，理智被再度纳入它的原则中，就可以再度经历它本身的起源。”这就是新的理知和新观念的诞生。以意象与感觉促进思索使之再结晶而具有新的活力，人类的思想，人类的信念和希望才能常新。

· 在诗的意象、意向和感觉世界中，“我们超越纯粹的理知所作的努力和探索把我们引导到某种更广大的东西中，而我们的理智正是由它构成……随着我们迫使自己超越于纯粹理智以外的程度，我们将要日益完全地回到这种实在之中。”一切进入诗境的诗都使我们进入思维与存在的本质中去。所以海德格尔说，一切进入诗境的诗都是还乡的，它使我们返回精神上的家园。

· 新诗的创造性想象
而人们太重理知甚至不知道那种自给自足的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反理性主义。当人们将其物化了的理性作用于文学活动时，他所建立的必然也是物化形态的文学，一种人的受动性的反映而不是美和自由的精神创造，对于文学的想象力在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生命史中具有什么意义，我们也远未作出正确的估价。由于人们对物利与权力的盲目崇拜，审美价值变成了和实在毫不相干的奢侈，使得我们的文学对这个世界竟然说不出什么有力的话来。

思想的解放给诗带来了想象力的解放。因为，感受美的机能并不直接是情感更不是理智，而是想象力。想象力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它将美的光芒迅速而强烈地辐射到情感和理智的领域，从理性和知性的强制中解放了生存的整体，这是新诗的出现和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民族心理基础。它试图重新确立审美价值在人的价值观中的地位，而把某种属于另

一个美与自由的世界中的秩序、意念带到这个世界中来。诗不只是经验的反映，它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经验本身。想象能够“在每条冰缝里长满大树/结满欢乐的铃铛和钟”，北岛如果不这样写，我们就永远经历不到这种经验。仅从这种意义上，新诗的出现也是可以理解而且是值得我们去理解的——它作为观察世界的视点，作为表现与抗议，作为表达方式。我们可以不带任何个人的倨傲而仅以美学的名义就有理由这样说：新诗是针对我们自身的偏见、怠惰或无知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精神的胜利。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容忍精神的话，就不会拒绝承认这种事实。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一个诗人，他是用诗和我们对话的人。诗的写作不是形象的论理或机智的格言，而是形象的浓缩：内中包含着认识之一切可能性——

在海洋渐渐退去的年代
 暴露的大地突然变得荒芜起来
 这时候，向日葵又神奇地到处生长
 偏僻的山坳、干裂的浅滩
 到处都有这金色的足迹，不懈地寻找太阳

(江 河)

这是另一片生命的海洋。僵死的主题消失了，作为创造者的主体出现了。思考通过它超越概念上的限界，通过它把不能有定义的理念当作自己的主题。也正因此新诗才能创造出作为人的新形象和新精神。它把我们的眼睛从赞美诗般的蒙昧主义的自内障里解放了出来，当文学和诗已死的时候，民族精神是不能独立的。

但是由于我们与诗人之间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文化思想